

日本黄檗宗寺院建筑梁架形制及其源流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Form and the Origin of the Framework of Obaku Temple in Japan

李沁园 | LI Qinyuan

摘要: 本文以日本长崎、京都的4座黄檗宗寺庙中的7座单体建筑为代表实例,从其实例特点出发,分析其祖型源流,指出其中五座建筑的梁架形制与中国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佛寺建筑梁架有较深的渊源,同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自身的地域特点。

关键词: 日本、黄檗宗、黄檗样、梁架形制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 seven single buildings of the four Obaku sect temples in Nagasaki and Kyoto in Japan as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and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analyse the origins of the structures. Then, this paper point out that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the five buildings has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owever, it has its ow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Japan, Obaku sect, Obaku style, Timber framework

黄檗样作为中国传入日本的最后一个建筑样式,由于对日本建筑的影响没有和样、禅宗样、大佛样深远,因此对其研究者甚少,缺少系统的对比研究,导致黄檗样的源流研究在中国建筑史学界尚属空白。何谓黄檗样?黄檗样建筑的特征是什么?黄檗样的祖型源流是什么?为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笔者在本文中主要针对黄檗宗建筑的梁架形制进行分析,追溯其源流。

日本黄檗宗源于我国明末福建福清临济宗黄檗派。明末崇祯时期(1628—1644年),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在隐元隆琦禅师住持期间发展成为闽地大禅刹之一,并自此创立了临济宗黄檗派,渐渐形成了黄檗教团,声名远播。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黄檗派首先传入了中国人往来频繁的港口城市日本长崎,从中国东渡的僧人先后在长崎建立了兴福寺、福济寺以及崇福

寺,但其传播范围仅限于九州长崎地区,所知者以及信奉者甚少;直至江户中期的1654年(日本承应3年,即清顺治十一年),隐元隆琦禅师受崇福寺住持之邀经由中左所(厦门)东渡长崎。隐元禅师起初传法于长崎四唐寺之一的兴福寺,在得到德川幕府的支持和赠地以后,于宽文元年(1661年)在京都宇治太和山开创新寺。出于对故乡的思念,隐元禅师仍将新寺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而京都万福寺的建立,为当时形式已经日趋僵化的日本建筑带去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其样式也就被称为“黄檗样”,与日本的和样、禅宗样以及大佛样并举。

由于日本黄檗宗寺庙与明清时期中国福建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其寺院建筑的结构类型与中国寺观建筑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笔者将日本黄檗宗寺院建筑按照中国传统梁架分类方法分为

作者:
李沁园,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博士后。

中国博士后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项目“匠作视野下日本‘黄檗样’样式谱系源流探析”(资助编号:2020M680821)成果。

DOI: 10.12285/jzs.20200819002

殿堂型、穿斗型、混合型（殿堂型与穿斗型构架的结合形式）。其中，殿堂型构架特征与宋《营造法式》中殿堂型构架的定义略有不同，《营造法式》中明确了殿堂型构架的一大特点为内、檐柱等高，而日本殿堂型构架的内柱略高于檐柱，按照《营造法式》分类应属厅堂型，但是从构造逻辑上分析，《营造法式》中殿堂型构架可分为三层——柱网层、斗拱层以及屋架层，且多设有天花，这与日本殿堂型构架特征相同。因此，笔者从建筑整体构造逻辑出发，将日本黄檗宗这类建筑构架归入殿堂型构架。^[1] 其代表实例如表 1 所示，表中实例均为早期黄檗宗寺院，其中九州长崎的三座寺院建立于日本黄檗宗创立之前，是最具代表性的早期黄檗宗建筑实例。

一、殿堂型

1. 实例表现

日本现存黄檗宗寺院约有 400 所，大多数建筑采用了日本江户时期盛行的殿堂型梁架，这类殿堂型梁架由草架层及柱网层构成，部分重要建筑还设有斗拱层。但是在这类梁架中，斗拱层不作为主要受力结构，多为装饰用，代表建筑有日本黄檗宗的祖庭——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大雄宝殿与法堂、长崎圣福寺大雄宝殿以及长崎清水寺大雄宝殿（图 1～图 4）。

2. 特点

日本黄檗寺殿堂型建筑以大雄宝殿、法堂为代表。其中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整体梁架由殿身梁架及副阶梁架构成，殿身及副阶屋檐均采用日本的重檐形制。其中殿身上部的草架层及屋面的重量由两道纵向在下、六道横向在上相搭的、粗大且断面为圆形的梁承接。下面两道纵向梁落在殿身内柱柱头上，其间用断面为方形的横向短梁相隔。殿身内四根内柱高于其余殿身檐柱。殿身一圈檐柱上设斗拱，斗拱为六铺作，单杪双下昂，其中上层昂尾伸

穿斗及混合型梁架案例列表 表 1

编号	寺院创立年代	建筑年代	所在地区	寺院名称	建筑类型	梁架类型
1	1661 年创建	1661 年	京都	黄檗山万福寺	大雄宝殿	殿堂型
2		1663 年			法堂	殿堂型
3	1620 年创建	1883 年重建	九州长崎	兴福寺	大雄宝殿	穿斗型
4		1881 年			三江会所门	穿斗型
5	1629 年创立，1635 年始建	1646 年		崇福寺	大雄宝殿	混合型
6		1731 年			护法堂	混合型
7	1628 年创立，1655 年完成建设	1655 或 1649 年		福济寺	大雄宝殿（已不存）	混合型



图 1：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大雄宝殿



图 2：京都黄檗山万福寺法堂



图 3：长崎圣福寺大雄宝殿



图 4：长崎清水寺大雄宝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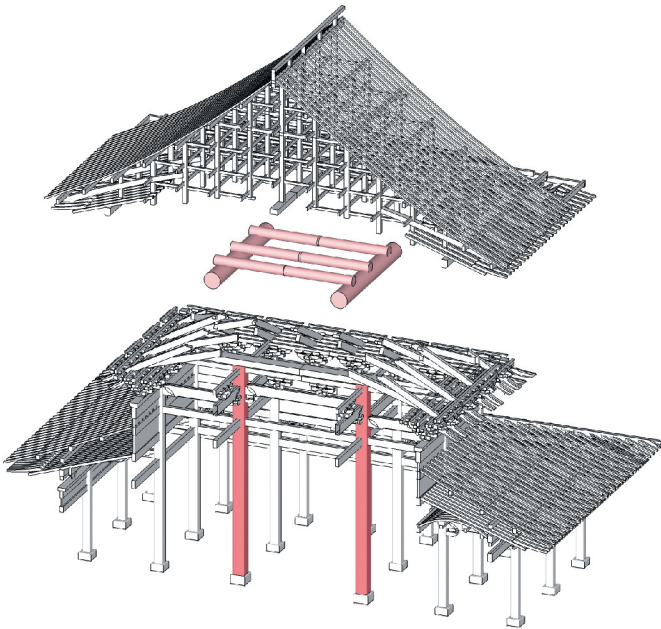


图 5：京都黄檗寺大雄宝殿承重构件示意图

入草架层，后尾钉于草架层的立柱上。在这座建筑中，斗拱层仅承接建筑檐部的重量并承担挑檐的功能（图5、图6）。

大雄宝殿露明部分的梁架由副阶前檐卷棚、殿身梁架以及三面副阶梁架组成。殿身檐柱及副阶檐柱上施阑额，柱头用阑额相连，阑额下用三道由额。上部两道额不仅起到联系柱网的作用，还用于承托副阶的两层椽子。阑额与第一道、第二道由额间设有照壁板。殿身前檐柱上最下层由额同样用于承托前檐卷棚轩廊的椽子。殿身内柱间、内柱与檐柱间均用椽枋及屋内额相连，内柱间椽枋位置略高于次间椽枋。内柱柱身上出丁头拱承明间椽枋，明间椽枋上施内额斗拱各两朵，形制为一斗三升加一道翼形横拱（图7）。

大殿副阶的檐枋落于泥道拱上方，斗拱不挑檐（图8）。除前檐副阶用卷棚轩廊的结构外，其余三面副阶构造相同，用月梁（日本称：海老虹梁）连接殿身檐柱与副阶檐柱，月梁一端插入殿身檐柱，另一端落在副阶檐柱柱头铺作上的第一跳横拱之上。副阶斗拱为四铺作，不设补间铺作，补间用一朵云型驼峰置于普拍枋之上，普拍枋下依次设置阑额、照壁板、由额（图9）。

法堂为单檐歇山顶建筑，梁架由上部草架层与柱网层构成，不用斗拱。同大雄宝殿的受力结构类似，屋面及草架层由其下方横、纵向上下搭接的梁承重。与大雄宝殿的区别在于，法堂下层纵向的梁直接落在殿身内柱柱头上。露明部分梁架同样由柱网层及草架层构成。各柱间用椽枋连接，椽枋上设平基枋，平基枋上设高度不同的平板天花（日本称为：镜天井）椽枋与平基枋间设有与大雄宝殿相同形制的云形驼峰。与大雄宝殿的区别在于，法堂仅用从内柱柱身各向出丁头拱承平基枋，而不同于大殿用丁头拱承椽枋，且法堂不用斗拱层，不设普拍枋。法堂前檐用出两跳的丁头拱挑檐，这点与大雄宝殿不同。由于法堂在屋檐位置同样采用了重椽的形制，下层椽实际是不承重的，真正承重的是两重椽之间的桔木，大雄宝殿亦如此（图10、图11）。



图6: 京都万福寺大雄宝殿上檐斗拱



图7: 京都万福寺大雄宝殿室内梁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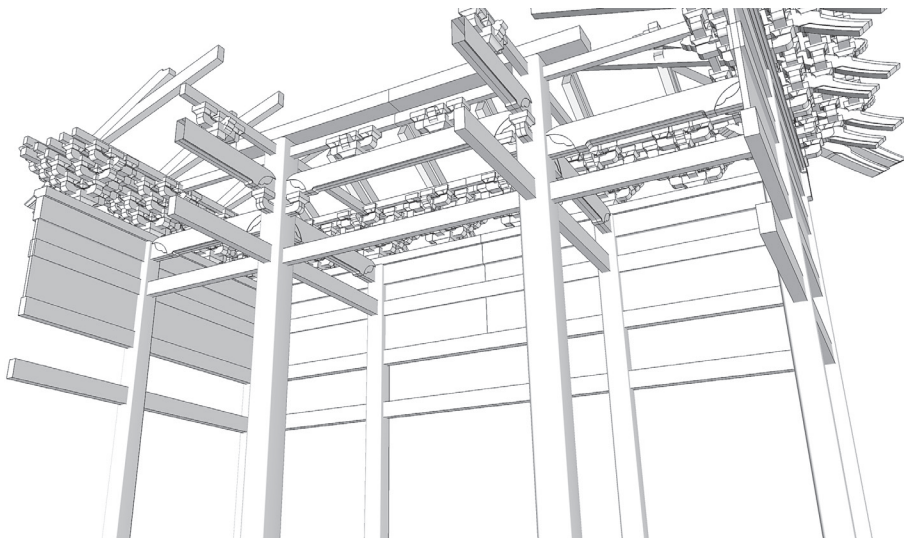


图8: 日本黄檗寺大雄宝殿殿身露明部分梁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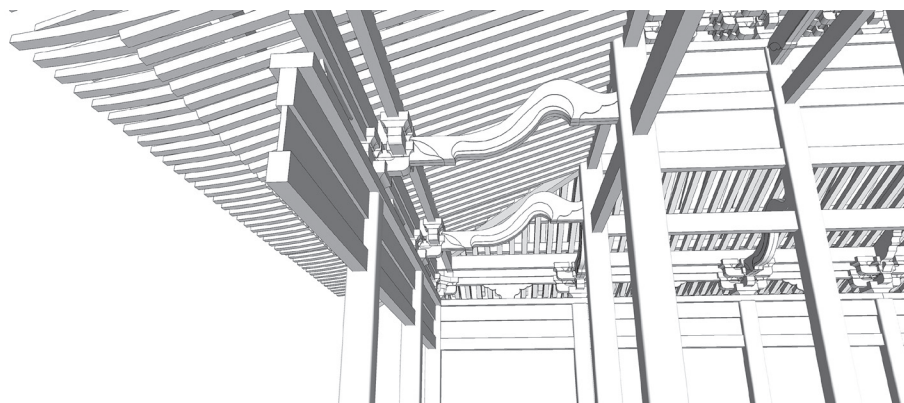


图9: 日本黄檗寺大雄宝殿副阶梁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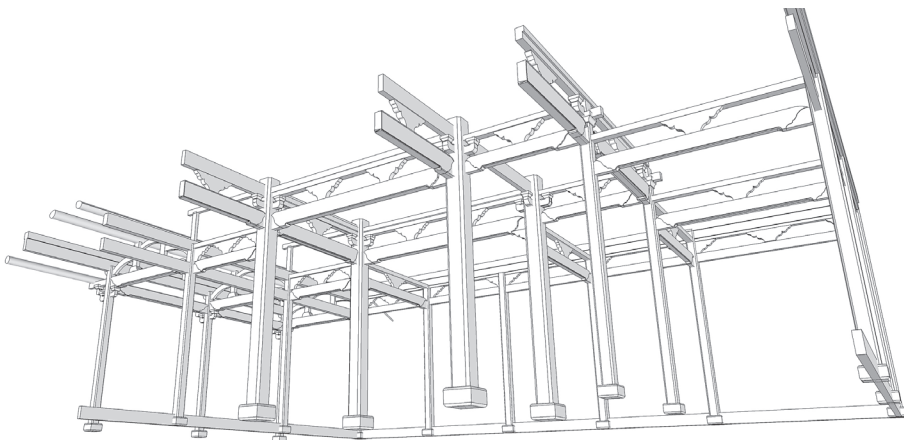


图10: 日本黄檗寺法堂露明部分梁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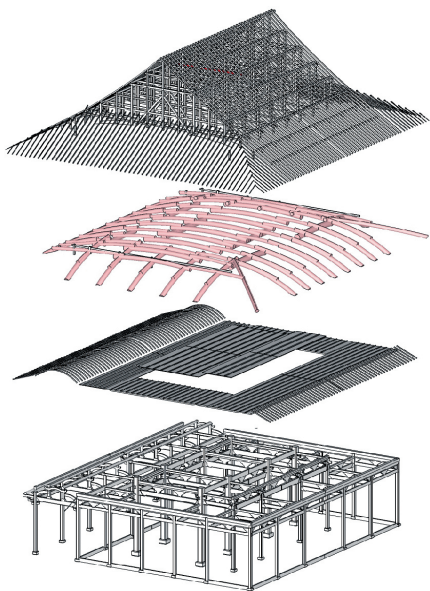


图 11: 日本黄檗寺法堂承重枯木示意图

3. 祖型源流与比较

黄檗寺大雄宝殿与法堂的殿堂型梁架形式，也流行于日本净土真宗各派寺院重要的建筑中。例如，位于日本三重县净土真宗高山派的专修寺御影堂及如来堂的梁架形制，便与京都黄檗寺大殿及法堂的形制极为相似。

对比高山派如来堂与黄檗寺大雄宝殿的梁架，可以发现，两者的梁架均由草架层与柱网层构成，同时屋架层的重量由其下方横、纵向粗大的梁承托，再传至殿身内柱。殿身檐柱及副阶檐柱下用普拍枋、阑额。殿身檐柱上用七铺作三下昂斗拱，昂尾同样钉于草架上，檐部的重量主要还是靠其间桔木承托。在日本这种双重椽做法中，桔木便是主要的挑檐构件，斗拱更多为装饰作用。殿身露明部分，用椽枋及屋内额连接各柱，椽枋与平棊枋间设六铺作计心斗拱。内柱升至第一层纵向梁下，直接承梁；为了与椽枋上的补间铺作契合，内柱柱身上出丁头拱插入柱身。前副阶轩廊也用月梁（海老虹梁）连接殿身檐柱与副阶檐柱。上述做法都与京都黄檗寺大殿类似，区别在于专修寺如来堂的露明梁架部分较少，为了增强结构的稳定性，在草架上用了两层纵、横向草架梁。除此之外，专修寺如来堂室内地面采用了日本传统的

“土间式”结构将地面用短柱抬升，抬升的高度随空间的重要性而不同（图 12）。

专修寺如来堂是在禅宗样建筑的基础上融合了和样以及大佛样的一些细部做法，而在日本近世产生的新建筑样式，被称为折中样，并在江户时期的社寺建筑中被广泛使用，与之构造类似的京都黄檗寺大雄宝殿也是江户时期折中样建筑的体现。

京都黄檗寺法堂的梁架形式为日本方丈类建筑的普遍样式，以和样为基础，草架部分落在柱网层上，草架层与柱网层间设置天花。同时又融合了禅宗样以及大佛样的部分特点，也是江户时期折中样建筑的体现。

在梁架主体上，就现存黄檗宗建筑的案例来看，在黄檗宗成立之后修建的建筑均采用日本江户时期的折中样。其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承托梁枋的做法的源流问题，笔者认为应源于日本大佛样建筑。“大佛样”又称为“天竺样”，为僧人重源在 12 世纪初期由南宋带入日本的建筑样式，其中大佛样在日本的典型代表便是奈良东大寺山门以及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大佛样建筑对于日本的影响远小于禅宗样以及和样建筑。但仔细观察日本近世禅宗建筑可以发现，虽然纯粹的大佛样建筑在日本存在不多且影响较小，但是在在大佛样出现之后与禅宗样手法相结合的形式一直在日本有所延续并没有彻底消失。例如京都东福寺山门柱上多出跳丁头拱出跳以及穿枋的使用（图 13 ~ 图 15）。大佛样已被传嘉年

证明源于中国宋代福建地区，而明清时期福建建筑多用丁头拱的做法也是在延续宋代做法。因此在日本出现的自柱身出丁头拱的做法与明清时期的福建同源，但不能说是源于明清时期的福建建筑，应该是受到日本大佛样建筑的影响。

二、穿斗

1. 实例表现

此类型的代表建筑是长崎兴福寺大雄宝殿及三江会所门，在这两座建筑的梁中所有柱均升高至檩下直接承檩；大雄宝殿除副阶檐柱上用斗拱承挑檐檩外，其余各柱同三江会所门相同，均直接承檩。檩上用单层椽，不用日本特有的重椽形式，不设草架，梁架均为露明造。大殿副阶前廊及会所门前廊均设置卷棚轩廊。两座建筑的横向梁架由柱及梁枋组成的各“扇”靠穿枋（屋内额）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图 16、图 17）。

2. 特点

兴福寺大雄宝殿的梁架形制细分应为柱梁式穿斗梁架，其梁架关系与《营造法式》中的厅堂型梁架较为相似。屋顶形式为悬山顶带一圈副阶。大殿进深方向共设六柱，殿身前后檐柱用一道八椽枋相连。八椽枋穿过殿身前后内柱，两端插入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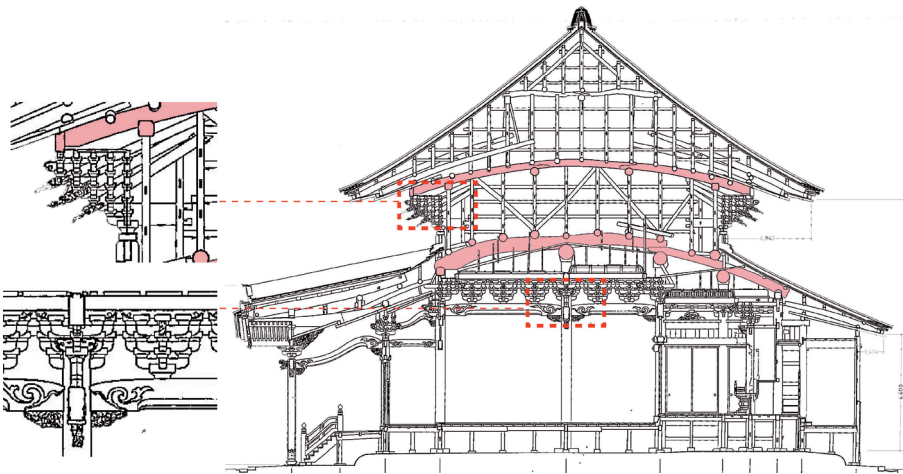


图 12: 专修寺如来堂梁架形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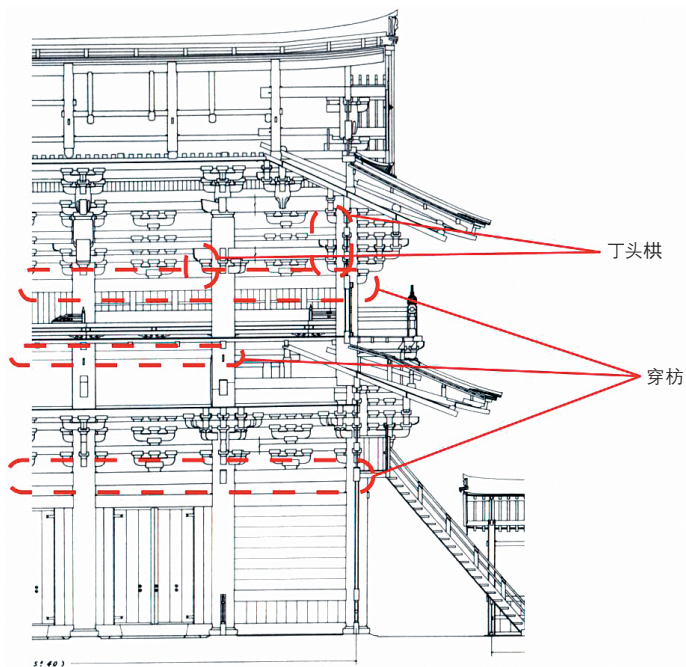


图13: 京都市东福寺三门穿枋以及丁头拱的使用



图14: 京都市东福寺三门穿枋



图15: 奈良东大寺三门穿枋



图16: 长崎兴福寺大雄宝殿卷棚轩廊



图17: 长崎兴福寺三江会所门卷棚轩廊

檐柱。殿身明间用施四椽枋，两端插入前后内柱柱头。四椽枋上设驼峰，上承蜀柱，蜀柱承脊檩。蜀柱两侧还设有两组由驼峰、斗拱所组成的组件承托两根月梁型割牵的一端，月梁型割牵的另一端插入蜀柱。次间用一道平直的乳枋连接殿身檐柱及内柱，其上设有与明间相同构成的月梁型割牵组件。副阶前檐用卷棚形式的轩廊，后檐用两道平直的乳枋连接殿身后檐柱及副阶后

檐柱，上层乳枋上施蜀柱，用蜀柱承檩。

大雄宝殿面阔方向同样施六柱，构成殿身三间，副阶两间。四扇横向梁架由两道穿过殿身内柱的屋内额、脊檩及前后檐檐枋下的顺脊串、各檩下的通长替木连接，屋内额两端分别插入殿身山面檐柱柱身中，屋内额用雕花雀替承托。两山面梁架做升起处理（图18～图20）。

大殿副阶檐柱上设普拍枋，柱头用阑

额相连。殿身前后檐与副阶四面的普拍枋上施斗拱。殿身前后檐下仅设有补间铺作，明间施三朵，次间施两朵。均为七铺作，前檐横枋仅有外拽横枋，不做里转横枋，为半拱的形式。其中，第一跳与第三跳横枋为昂型，第二跳及第四跳横枋做兽头型；各跳均偷心。后檐铺作不做横枋，仅做四道泥道拱，拱长随层数递增（图21～图23）。副阶前檐铺作为五铺作，横枋同样为半拱，重昂形式，耍头也是兽头型。其余三面仅柱头铺作用横枋，横枋同样为半拱，不做昂型，偷心。补间铺作同殿身后檐相同，不用横枋，仅有两层泥道拱。

三江会所门的梁架形式为柱梁式穿斗。进深方向明间脊檩下的内柱落地，其余各檩与脊檩下的中柱间用椽枋连接。檩下设蜀柱，蜀柱落于下层椽枋之上。该梁架与《营造法式》中的分心前后乳枋用五柱的梁架类似。但三江会所门前后椽枋不对称设置。前檐柱上用丁头拱承托月梁型割牵，形制与大殿中的月梁型割牵相同。割牵一端插入檐柱柱身，另一端承檐檐枋（图24、图25）。

3. 祖型源流与比较

兴福寺这两座建筑在梁架整体形式上与混合型的建筑（崇福寺与福济寺，下文有述）中的露明部分明间梁架形式相同，均为柱梁式穿斗梁架。具体在梁架的具体做法上不同。兴福寺大雄宝殿在殿身及副阶施有斗拱，而崇福寺与福济寺则没有。除斗拱外，普拍枋以及翼角发戗的做法也是兴福寺大雄宝殿的特征之一。兴福寺两座建筑均在檩下设通长替木，而福济寺与崇福寺仅用舌型替木。明清时期福建传统木构建筑很少采用通长替木的做法，这类做法更趋近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做法（图26）。

兴福寺大殿梁架的构件形制不同于崇福寺两座建筑中源于闽东建筑构件形制，也不同于源于福济寺大殿中构件带有明显日本江户时期特征的做法。兴福寺斗拱中下昂的昂型与盛行于明清江浙地区的“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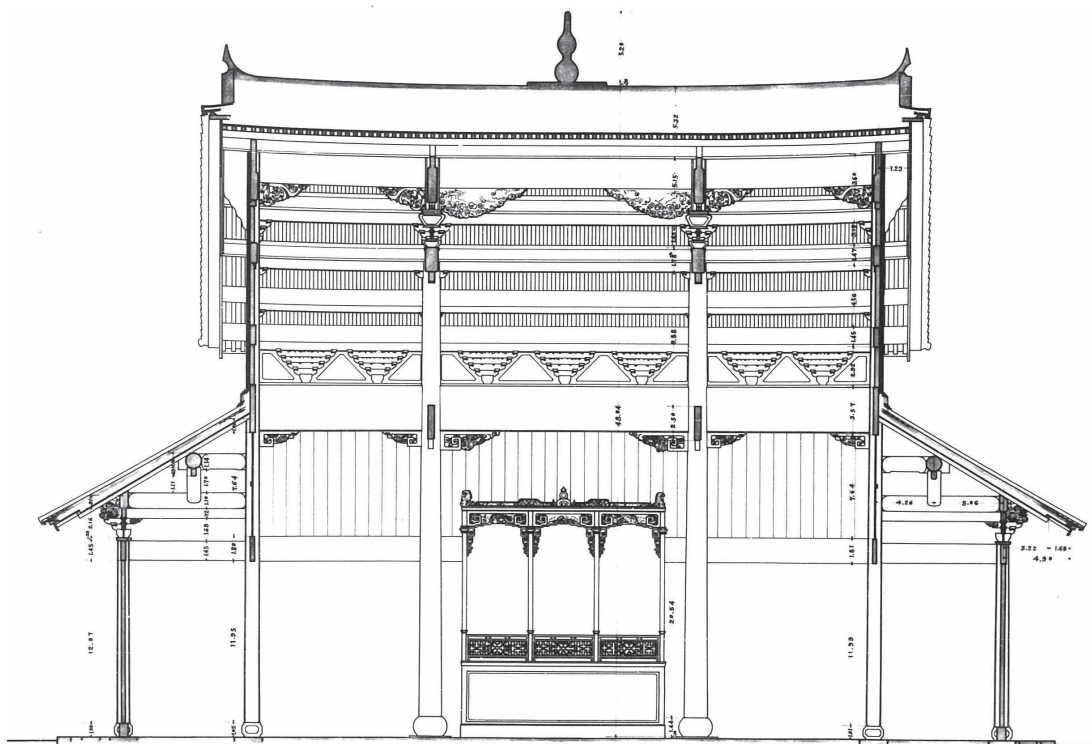


图 18: 福寺大雄宝殿纵剖面图



图 19: 兴福寺大雄宝殿明间梁架 (左)



图 20: 兴福寺大雄宝殿次间梁架 (右)



图 21: 兴福寺大雄宝殿殿身前檐斗拱 (左)



图 22: 兴福寺大雄宝殿副阶前檐斗拱 (中)



图 23: 兴福寺大雄宝殿副阶斗拱内侧 (右)



图 24: 三江会所门明间梁架 (左)



图 25: 三江会所门挑檐形式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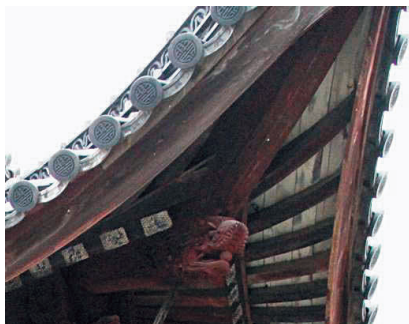


图26: 兴福寺大雄宝殿副阶翼角发戗做法



图27: 兴福寺大雄宝殿冰裂纹窗户

头昂”类似；其余诸如割牵等构件出头部分做兽头型样式的做法、冰纹以及斜人字纹的门窗也多见于明清江浙地区（图27）。

因此可以推断，这两座建筑在建造的时候有中国江浙地区的工匠参与。相比寺内其余建筑，例如从寺门以及妈祖堂的梁架和构件形制几乎体现了日本江户时期的建筑风格上看，兴福寺大雄宝殿及三江会所门不论梁架形制还是构件形制，均不带有日本江户时期建筑的特点，极有可能是中国匠人独立完成的。

三、混合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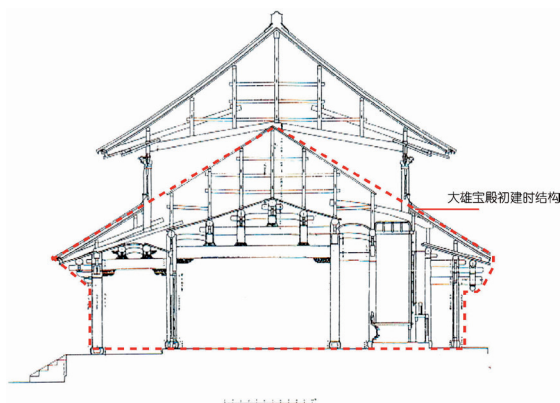
1. 实例表现

此类梁架的代表建筑是长崎崇福寺大雄宝殿与法堂、福济寺大雄宝殿。崇福寺大雄宝殿初建时即为日本传统的双层屋面结构，即使用上下两层椽子，下层椽子不承重，在日本称为化粧垂木，其下便是穿斗梁架所在（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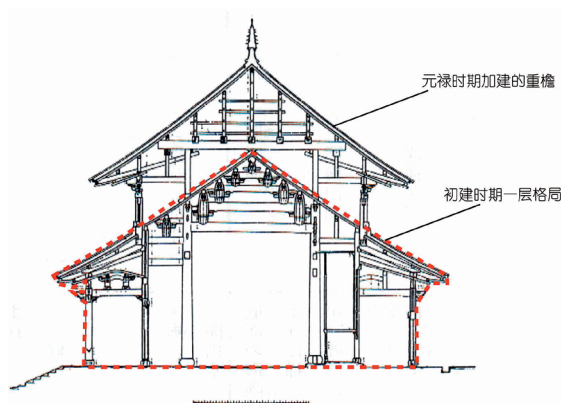
2. 特征

崇福大雄宝殿整体梁架由最下层的穿斗梁架层以及上面两层草架层所形成的三层结构层构成。上下两层草架层的重量通过其下各自的受力构件传递至最下层的柱网上。护法堂为单檐，所以其结构层由下层穿斗结构层及上层草架构成。其受力构件以及力的传递方式与大殿相同。两座建筑草架层的重量由其下横向、纵向的大梁以及桔木承接。大梁与桔木均压在最下层的柱网上，将草架层及屋顶的荷载传至柱网层（图29、图30）。

崇福寺大殿及护法堂间梁架形式均为柱梁式连架结构，采用插梁式的做法。内柱升高至檩下直接承檩。殿身内柱以三道穿枋连接。最下层椽桷上置驼峰，其上用蜀柱承檩，蜀柱间用乳栿以及割牵相连。前廊均采用卷棚轩廊的形式。这类卷棚构造形式借鉴了中国闽东地区明代建筑的做法^[2]（图31、图32）。



崇福寺大雄宝殿



福济寺大雄宝殿

图28: 崇福寺大殿及福济寺大殿初建时及加建重檐后梁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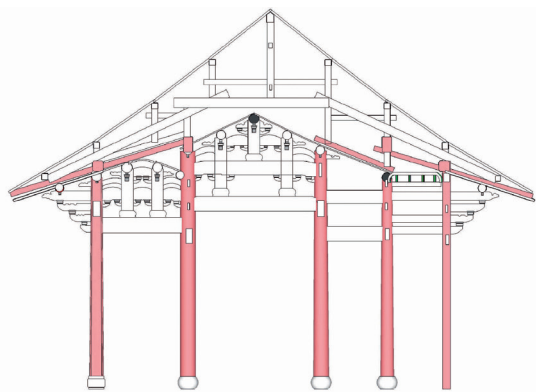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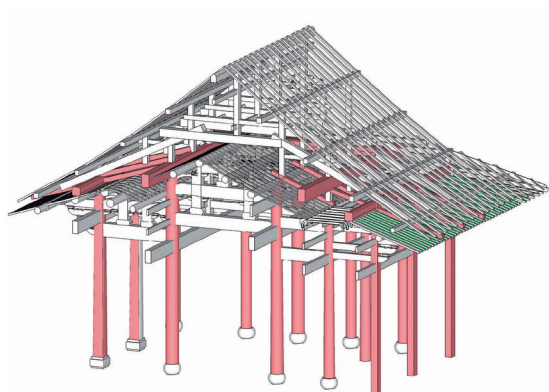


图29: 崇福寺护法堂主要承重构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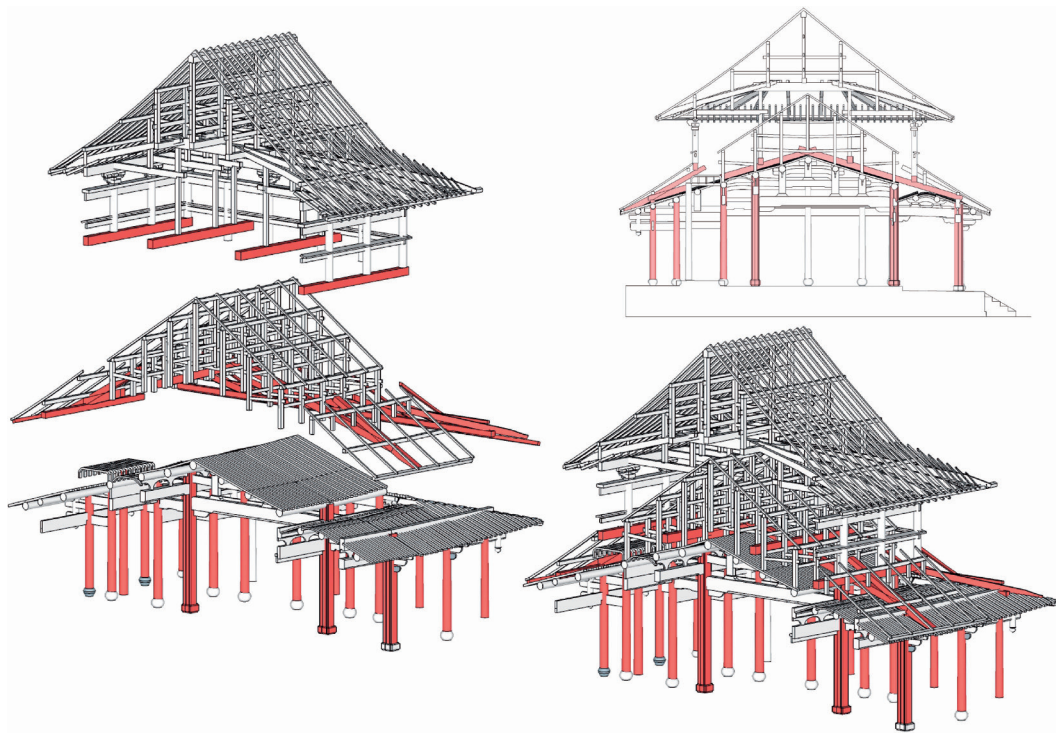


图 30: 崇福寺大雄宝殿梁架中主要承重构件



图 31: 崇福寺大雄宝殿卷棚轩廊



图 32: 崇福寺护法堂卷棚轩廊

大雄宝殿次间施七柱，为串式穿斗结构（穿斗型）。各柱间用穿枋穿过柱身相连，为典型的穿斗式结构的特点。前后内柱间用两道穿枋，其上用四椽枋承蜀柱，蜀柱直接插在枋上，不设驼峰。蜀柱间各设一根刹牵连接脊檩下的中柱。后内柱与后檐柱之间也用两道枋相连，一端插入内柱柱身，另一端穿过后檐柱（图 33）。

同时崇福寺大雄宝殿一层采用了两种挑檐形式，明间前檐两檐柱上出两跳丁头拱，上承卷棚轩，下梁出头，承挑檐檩。其余各檐柱上均采用垂花柱挑檐（福州地区将垂花柱挑檐称为“悬充挑檐”）（图 34）。大殿侧面檐柱采用了类似垂花柱挑檐的形式，但不用垂花柱，仅用一根短柱骑在前梁挑出的尾上，其构造形式与垂花柱挑檐形式相同，

故将其归于垂花柱挑檐一类。护法堂、钟楼均采用丁头拱挑檐（图 35、图 36）。

福济寺大雄宝殿的梁架整体形制在加建重檐草架之前为穿斗梁架。在二战被毁前的梁架整体形制为殿堂型，同崇福寺的两座建筑相似，草架层所构成的整体屋架层承托瓦、脊，整体架于其下的桔木以及柱网层上的纵、横向梁上。整体可以分为草架层和露明梁架层。露明层即为穿斗梁架的形式。因此该建筑的整体为殿堂型梁架包含穿斗梁架。

福济寺大殿露明部分的明间穿斗梁架为柱梁式穿斗中的插梁型梁架。首先，殿内各柱均升高至檩下直接承檩。进深方向前檐采用卷棚轩廊的形式；后檐轩廊不设卷棚，用一道平直的乳枋承

蜀柱，上承檩。明间施四道椽栿，其上两端各设有一根蜀柱，蜀柱均直接落在梁栿上，层层向上直至平梁。明间各道椽栿均插入蜀柱柱身，蜀柱柱身两侧出丁头拱承椽栿。前次间用两道平直的乳栿连接门柱与内柱，上层乳栿上设蜀柱承檩。后次间仅用一道乳栿，高度同前次间上层乳栿相同。其上同样设蜀柱承檩（图 37）。

大殿次间梁架根据被毁前的照片记录可以看出采用的是串式穿斗结构（穿斗型），共有九道穿枋穿过各柱，脊檩下的中柱落地（图 38）。



图 33: 崇福寺大雄宝殿室内穿斗梁架

大殿纵向梁架同样用多道屋内额（穿枋）将各扇梁架连接成一个整体。最下层穿枋用雀替承接，第二、三层穿枋由出自柱身的两跳丁头拱承接；第四层与第五层穿枋之间设有驼峰，上承一斗，其中明间施两朵，次间施一朵（图 39）。

3. 祖型源流与比较

两座建筑的横向梁架形式与明代闽东地区的做法极为相似，特别是崇福寺大雄宝殿与福州圣泉寺法堂的梁架不论构成还

是构件形制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度。两者的建造时间也仅相差数年。福州圣泉寺法堂原为大雄宝殿，其横向明间梁架同样施三道梁栿，最下层梁栿上设驼峰，其上用蜀柱承檩，梁栿均插入蜀柱及内柱的柱身。梁栿的形制也与崇福寺大殿相似度极高（图 40）。护法堂的梁架形式也是明代闽东地区遗构中，特别是民居建筑中非常常见的形式之一（图 41）。

大雄宝殿及护法堂的面阔方向，各扇梁架均由纵向的穿枋相连。大雄宝殿纵向穿枋（内额）间设有弯枋。同时在次间两槁架上还做了升起处理，即福州地区的超扇做法，自明间槁架开始到次间槁架的檩木略微提升，使面呈现出缓升的曲线（图 42）。

因此这两座建筑不光梁架形制源于闽东地区，且修建两座建筑的匠人极有可能是源于闽东地区的同一匠作派系。做出此推断的原因是，闽东地区的柱梁式穿斗梁架的构成形式非常丰富，而日本崇福寺大殿与福州圣泉寺的这类梁架形式以及构件做法在闽地并不常见。可以说，与崇福寺大殿如此相似的建筑在闽地仅有这一处。

同时在挑檐方式上，大雄宝殿的挑檐形式与福州寺庙与民居的挑檐形式类似，但也有一定差别。比如明代闽东民居大多使用丁头拱挑檐，垂花柱挑檐的形式是在清中期才开始陆续出现，而崇福寺大雄宝



图 34: 崇福寺大雄宝殿的垂花柱挑檐



图 35: 崇福寺护法堂丁头拱挑檐



图 36: 崇福寺钟楼丁头拱挑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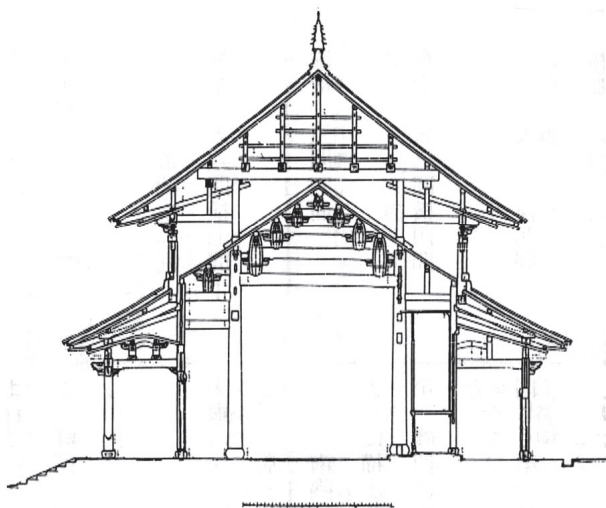


图 37: 福济寺大雄宝殿明间横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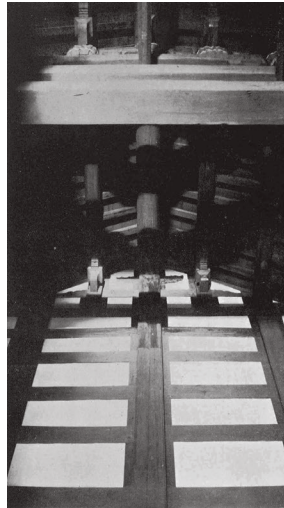


图 38: 福济寺横向次间梁架



图 39: 福济寺大雄宝殿纵向次间(上)与明间梁架(下)

殿初建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第一，崇福寺大雄宝殿在后来的改建或修缮时将原本的丁头拱挑檐改为了垂花柱挑檐，但并未记载；第二，垂花柱挑檐形式可能明末清初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地出现于清中期。笔者认为第一种推测可能性较大（图43、图44）。

据记载，修建崇福寺的大工名为“大串五良平”，小工名为“大藏”，从名字上看均为日本人，但当时长崎地区闽地移民众多，且很多移民将名字改成了日本名字。因此笔者推测：一是所记载的大工可能为闽地明代移民；二是虽然记载的大工为日本人，但实际有很多中国工匠参与了这两座建筑的建造，只是由于当时中国人的地位较为低下，所以没有被记载。无论怎样，崇福寺的这两座建筑与该寺其余建筑相差甚大，其余建筑从梁架类型上来说，更多地反映的是日本江户时期建筑的特点。因此，可以断定崇福寺的这两座建筑有中国工匠的参与，且有极大可能为闽东地区的工匠。这群工匠在这两座建筑中扮演了其重要的角色。

福济寺大雄宝殿的梁架形制与闽南地区的柱梁式穿斗梁架中“蜀柱抬梁”形式较为类似，区别在于闽南地区的该类型梁架中中间椽杓多置于蜀柱之上，且蜀柱不直接承檩，檩与蜀柱之间多隔有斗或用其上的椽杓承檩，是为“蜀柱抬梁”。而福济寺的椽杓均插入蜀柱柱身，蜀柱与檩之间不设斗。当然这种梁架中将椽杓插入蜀柱的做法在闽南地区也是存在的，只是数量少于“蜀柱抬梁”。例如泉州涂门街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大厅就采用的是这种将椽杓插入蜀柱柱身的做法（图45）。

同时，闽南地区进深方向明间多用“三通五瓜”“二通三瓜”，即三道椽杓上设五根蜀柱、两道椽杓上设三根蜀柱。而福济寺大殿由于屋顶高耸，为了与结构相适应，明间用了四道椽杓、七根蜀柱，转换成闽南术语则为“四通七瓜式”，这在闽南地区也极为少见（图46）。

虽然福济寺大殿的梁架形式在部分做



图40：圣泉寺明代法堂明间梁架



图41：福建福州明代石松寺古殿穿斗梁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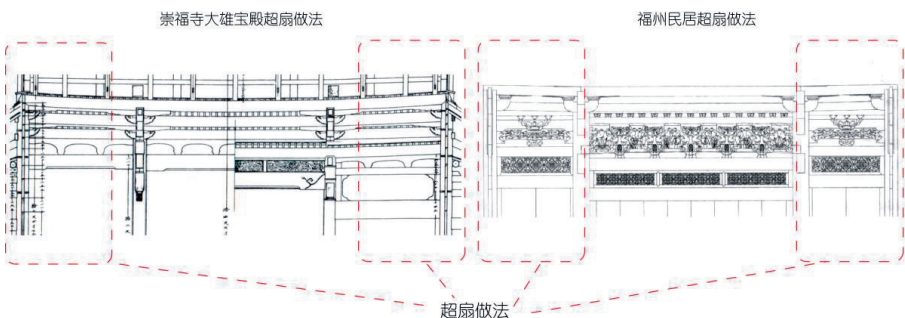


图42：崇福寺大雄宝殿以及福州民居的超扇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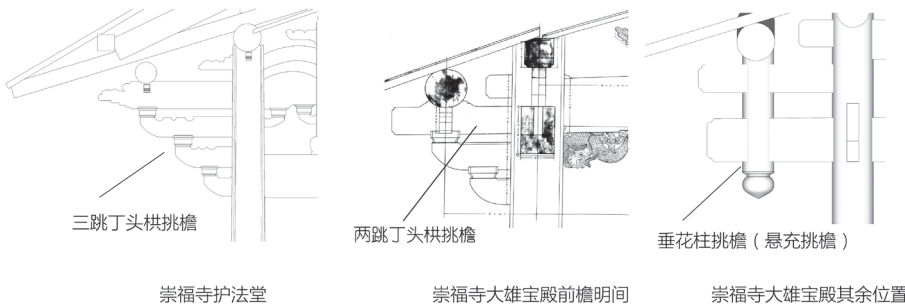


图43：崇福寺护法堂及大雄宝殿挑檐形式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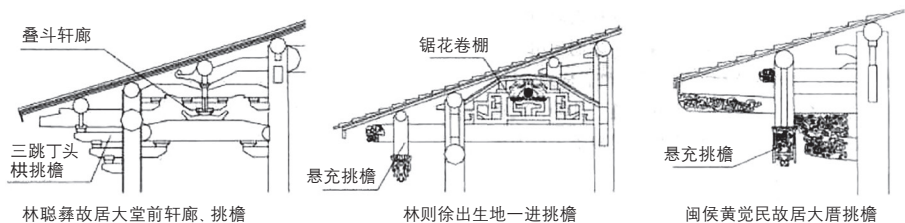


图44：闽东地区挑檐形式

法上与闽南地区存在差异，但是其露明部分的梁架构成形式与闽南地区的柱梁式穿斗梁架最为接近，且该梁架形式也没有在日本出现过。同时，福济寺又被称为“泉州寺”“漳州寺”，该寺的创建者为泉州开元寺而来的禅师，其基址也是泉州渡日商人捐赠的。因此，福济寺大雄宝殿在修建过程中由来自闽南的渡日工匠的参与也是正常的。福济寺大殿与上文中崇福寺大殿

及护法堂虽同为柱梁式穿斗结构，但其殿身结构形式有很大的区别。

综上，福济寺大雄宝殿的梁架形制应该源于明末的闽南地区。同崇福寺一样，修建福济寺大殿的工匠中有来自闽南地区的匠人。但就福济寺大殿梁架以及构件细部的做法而言，中国匠人在修建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程度应该小于修建崇福寺两座建筑的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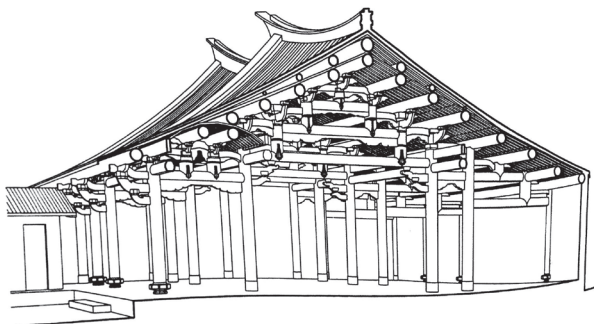


图45：泉州涂门街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大厅梁架结构



图46：闽南“三通三瓜式”梁架结构

四、结语

不同于日本寺社建筑，黄檗样的梁架形式借鉴了源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穿斗梁架，这类梁架可以被称为黄檗样梁架。

作为黄檗宗下辖寺院的长崎三福寺（福济寺、兴福寺、崇福寺）中的五座建筑（崇福寺护法堂及大雄宝殿、福济寺大雄宝殿、兴福寺大雄宝殿及三江会所门），其梁架形制并未受到日本江户时期建筑的影响，主体结构借鉴了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样式。其中，崇福寺大殿及护法堂的梁架形制应借鉴了明末清初闽东地区寺观的穿斗梁架形式；福济寺大雄宝殿梁架形式应借鉴了明末清初闽南地区寺观的穿斗梁架形式；兴福寺大殿及三江会所门的梁架形制应借鉴了明清时期中国江浙一带寺观的做法。结合长崎唐三寺建寺目的以及过程，三寺作为在当地移民的支持以及信仰需求下的产物，分别由渡日的福州、泉州、南京商人出资修建，基于当时各地区渡日移民的团结以及群居特性，也能从侧面反映这三寺的匠作源流。

因此，日本黄檗宗建筑创立之后的寺院建筑在梁架上采用了殿堂型结构，其梁架形制并没有受到太多中国明清时期建筑的影响，而是采用了日本江户时期盛行的折中样。

注释

- [1] 本文所述殿堂型、厅堂型、穿斗型从构造逻辑上分析，参考了张十庆老师在其《从建构思维看古代建筑结构的类型与演化》一文中对梁架分类的研究，其对应关系为：殿堂型—层叠型，厅堂型、穿斗型—连架型。笔者认为此种分类方式更能直接地对日本以及中国福建构架进行定义，但从行文上考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构架分类方法。
- [2] 针对黄檗宗寺院卷棚轩廊的祖型源流研究，可参见拙作《日本黄檗宗寺院“卷棚轩廊”研究》、《建筑史》，45辑，2020年。

参考文献

- [1] 王荣国. 福建佛教史[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 [2] 林观潮. 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M].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
- [3] 平久保章. 新纂校订隐元全集[M]. 开明书院，1979.
- [4] 潘谷西. 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5] 太田博太郎监修. 日本建筑样式史 ニホン ケンチク ヨウシキシ：カラー版[M]. 東京：美術出版社，1999.
- [6] (宋) 李诫撰. 故宫博物院编 著. 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影宋抄本营造法式[M].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
- [7] 京都府教育委员会. 重要文化財萬福寺大雄宝殿禅堂修理工事报告[R]. 昭和45年3月.
- [8] 崇福寺. 国宝 崇福寺大雄宝殿、第一峰门修理工事报告[R]. 平成7年3月.
- [9] 日本文化厅编. 宗教年鉴[M]. 2003.
- [10] 西和夫. 图解古建筑入门[M]. 彰国社，1990：88.
- [11] 专修寺. 重要文化財专修寺如来堂修理工事报告

[R]. 京都：京阳社，平成2年3月.

[12] 太田博太郎監修. 日本建築様式史ニホンケンチク ヨウシキシ：カラー版[M]. 東京：美術出版社，1999.

[13] 京都府教育委员会. 国宝 東福寺三门修理工事报告[R]. 昭和53年3月.

[14] 傅熹年. 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鎌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J]. 建筑学报，1981(4).

[15] 天沼俊一. 日本建筑史图录[M]. 星野书店，1933.

[16] 阮章魁. 福州民居营建技术[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17] 木宫泰彦. 中日佛教交通史[M]. 华宇出版社，1986.

[18] 王翰五. 中国日本交通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9] 曹春平. 闽南传统建筑[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20][日] 木宫泰彦. 中日佛教交通史[M]. 华宇出版社，1986.

图片来源

图12：笔者自绘，底图来源：《重要文化財专修寺如来堂修理工事报告》

图13：笔者自绘，底图来源：《国宝 東福寺三门修理工事报告》

图18：李长蔚提供

图28、图37：笔者自绘，底图来源：《崇福寺大雄宝殿、第一峰门修理工事报告》

图38、图39《日本建筑史图录》

图40：张继洲提供

图42、图44：笔者自绘，底图来源：《福州民居营建技术》

图45：《闽南传统建筑》

其余图表均为笔者自绘/自摄